



论韦拔群

黎国轴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前 言

韦拔群是广西东兰县人，壮族，1893年2月6日生。他在青少年时代，由于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在辛亥革命后，就走上了旧民主革命的道路。1916年，参加“护国军”，投身于反对北洋军阀袁世凯的武装斗争。从1922年起，从事农民运动。1925年春，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逐步地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同年冬，在东兰县武篆区列宁岩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1926年2月，任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主任。是年冬，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田南道（右江地区）农民运动办事处副主任。1929年，任广西省农民协会副主任。同年12月11日，他和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一道，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任红七军第三纵队司令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委员。1930年，红七军改编后，任二十一师（后改为右江独立师）师长。1931年，被选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1932年10月19日，被叛徒杀害，光荣牺牲。由此可见，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而战斗的一生。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是广西各族农民运动的领袖，是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战士。

韦拔群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下，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树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革命人生观，培养了革命精神、高贵的品质和优良作风。

深受广西各族人民的敬仰和爱戴。党和人民给予他极高的评价。敬爱的邓小平同志指出：“韦拔群同志以他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解放的事业，最后献出了他的生命，他在对敌斗争中，始终是英勇顽强，百折不挠的。他不愧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英雄。他最善于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对人民解放事业，具有无限忠心的崇高感情。他不愧是名符其实的人民群众的领袖。他一贯遵守党所分配给他的工作岗位，准确地执行党的方针和政策，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他不愧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韦拔群同志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他永远是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后代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纪念他！”（见《回忆韦拔群》一书）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话，正确地反映了党和人民对韦拔群同志的评价。

过去，我们对韦拔群的光荣事迹宣传了一些。但是，还做得很不够，对他诸方面的研究做得更少。今后，这些方面的工作必须加强。以便用韦拔群同志的革命精神、高贵品质和优良作风来教育人们，激励人们的热情，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四个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论韦拔群》是一本研究韦拔群同志的论文集。它在对韦拔群同志的研究方面牵了头。俗话说：“一花引来百花开”。希望这本书出版后，跟着有更多的研究韦拔群同志的著作问世。这是我——韦拔群的忠诚学生和亲密战友的心愿。

黄松坚

目 录

论韦拔群革命思想的发展·····	(1)
韦拔群在我党武装斗争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17)
论韦拔群的人生观·····	(36)
论韦拔群的民族观·····	(46)
论韦拔群的哲学思想·····	(61)
论韦拔群的教育思想·····	(72)
论韦拔群的军事思想·····	(81)
韦拔群革命诗歌浅论·····	(101)
论韦拔群的家庭出身问题·····	(127)
辛亥革命对韦拔群的影响·····	(137)
韦拔群的初期革命活动及其向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142)
韦拔群与百色起义·····	(166)
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伟大尝试·····	(175)
韦拔群是文明礼貌的模范·····	(178)
文明礼貌，流芳千古	
——韦拔群文明礼貌二、三事·····	(182)
千锤百炼为人民	
——韦拔群品德修养二、三事·····	(185)
高风亮节传千秋	
——韦拔群崇高风格二、三事·····	(188)
纪念韦拔群，学习韦拔群·····	(191)

“快乐事业，莫如革命”

——韦拔群传略……………(195)

论韦拔群革命思想的发展

韦拔群是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工农红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权的领导者之一，是一位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他于1932年10月19日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天，我们缅怀他的革命业绩，研究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崇高品质和优良作风，对于我们今天更好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是有现实意义的。

韦拔群的一生，是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是不断革命、不断进步的一生。他的革命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少年时期及其革命思想的产生；（二）1916年——1924年，在民主革命思想影响下，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三）1925年1月——3月，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成为一个初步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四）从1925年4月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革命斗争中锻炼成长，逐步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一）

韦拔群，初名秉乾，后名萃，字拔群。1894年2月6日（农历甲午年正月初一）出生于广西东兰县武篆区中和乡勉娥村东里屯的一个壮族地主家庭。

韦拔群生长的时代，正是国内外社会发生剧烈变动的时

代。在国际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上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先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所固有的三大矛盾不断发展，导致了帝国主义国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民主革命的爆发。在国内，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的侵略，我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进一步受到破坏，帝国主义侵略日益深入，而清政府更加腐败，内忧外患极为严重。同时，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不断发生，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在这样剧烈的社会大变动面前，韦拔群的思想深受震动。

韦拔群青少年时期，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生活非常痛苦。在东兰、凤山等县，地处偏僻，“山高皇帝远”，地主、官僚、土豪劣绅和军阀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特别残酷，人民生活特别痛苦。在这里，地主要佃户把产品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交作地租，还要农民给他服劳役，逢年过节，送柴草、木耳、竹笋、腊老鼠肉等土特产，对农民进行超经济剥削。有些地主还规定农民结婚时，要给他享有“初夜权”。地主、豪绅还建立私人武装，私设牢房，任意鱼肉人民。军阀政府也要农民交纳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据1923年在东兰县的统计，全县除了田赋、屠捐、烟酒牌照税三项税收于十年间逐年增加高达十余倍以外，又有自治捐、户口捐、市场摊位捐、团丁伙食费及学堂建筑捐等等。”①甚至农民起房子也要屋捐，农民的女儿出嫁也要交四“摆”②长的布为出嫁税。居住在山寨里的瑶族，除了受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外，还受民族歧视。例如，限制他们不得读书识字，不得穿白衣服和布鞋等等，生活更加痛苦。

韦拔群的父亲是个靠剥削为生的地主。他对农民的剥削

和压迫非常厉害，农民到他家交租还债，往往挨骂受打，弄得哭哭啼啼。他父亲对子女的教育，是封建礼教加棍棒。因此，韦拔群同志从小就非常讨厌他的父亲，厌恶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

在韦拔群家的周围，住的都是一些贫苦的农户。韦拔群从小的时候起，经常跟贫苦农民的孩子玩耍，有时还跟着他们下田下地劳动。他耳闻目睹农民生活的痛苦状况，逐渐产生了对贫富不均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同情农民的痛苦。他曾瞒着父亲，把家里的粮食和钱送给贫苦的农民。

1908年——1910年，韦拔群进入东兰县高等小学堂读书。在这期间，他看到了更多的地主、豪绅、官僚、军阀横行霸道，农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悲惨情景，使他更加仇恨地主、官僚、豪绅和军阀。他把官僚、地主、豪绅比作活阎王和凶神恶煞，他说：“你们这些凶神恶煞，我长大了一定打倒你们！”③

残酷的现实生活，促使韦拔群产生了改革社会的革命思想。

韦拔群从小时候起，就经常爱听乡邻父老讲革命故事。如“岑逊王领头抗官兵”④，“打土官韦虎臣”⑤，“刘二打蕃鬼”⑥，“洪杨领导太平天国革命”⑦等革命故事，他都百听不厌。到青年时期，他又十分喜爱读反映农民斗争的书籍，特别爱读《水浒传》之类反映农民斗争的小说。这样，青少年时代的韦拔群，深受革命故事和英雄人物的影响，使他逐渐产生了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从而使韦拔群进一步坚定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思想。

(二)

由于韦拔群有了强烈的民主革命思想，后来便逐渐成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坚决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反对封建礼教。

1912年2月，在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支持下，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统治了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对外投降卖国，对内残酷压迫剥削人民，用封建礼教来毒害人民，成为帝国主义和中国建封主义的忠实代理人。因此，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当时韦拔群也积极地投入到这股革命洪流中去。

1912年春，韦拔群考上了宜山庆远中学堂。在学习期间，“他常常在同学中间发表不满当时政府的言论，提出了反对黑暗政治的口号”^⑧，他还“积极活动，宣传封建制度的罪恶，鼓吹革命。”^⑨庆远中学的校长，是清朝的举人。他经常给学生灌输封建礼教；每到他的生日，还要学生给他送礼，叩头拜寿，甚至要学生列队夹道向他欢呼：“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表示庆贺。韦拔群坚决反对反动校长的这种作为，气愤地说：“现在已经是民国时代了，为什么还抱着旧皇历不放呢？”^⑩到校长生日那天，他鼓动学生不给校长拜寿。因此，他被开除了学籍，但他并不后悔。这反映了他对封建势力毫不妥协的态度。

1915年12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悍然称帝。全国各地掀起了反袁的“护国运动”。云南、贵州等省组织了“护国军”。1916年元月，韦拔群变卖了部分田产，购买枪械，召集了一百多人到贵州去投军，参加反袁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韦拔群在黔军张毅部队中任参谋。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在部队里常和一些青年军官讨论社会问题，秘密散发传单，揭露社会的黑暗，宣传革命道理。他在传单中署名为“愤不平”。

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反对北洋军阀统治和立志改造社会的决心。

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韦拔群逐步认识到：不仅北洋军阀政府是人民的敌人，而且整个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土豪劣绅都是革命的对象。因此，在1923年举行的一次农民集会——银海州会议上，他号召农民群众“把整个封建地主、土豪劣绅毁灭掉！……”^⑪

第二、坚决不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僚。

是做人民的勤务员，还是当骑在人民头上的官，是衡量一个人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重要标志之一。在这个问题上，韦拔群的态度是非常鲜明的。韦拔群离开了庆远中学，于1913年春进入桂林政法学堂就读。这个学校是专为剥削阶级培养官僚的。韦拔群很讨厌这样的学校，经常在行动上消极对抗。例如，学校规定学生一律戴四方顶的法官帽，穿长袍马褂，而韦拔群则经常把四方帽的布顶拆去，只戴帽框，把长袍脱去，光穿马褂。后来，校长叫他去，训斥说：“象你这种模样，还好做官？”他坚定地回答说：“我不想做官，”“我是来求学的。”^⑫不久，他毅然离开了这个学校。

1920年10月，韦拔群离开黔军，到了广州。当时，以马君武为首的广西籍国民党人，在广州成立了以推翻桂系军阀陆荣廷为宗旨的“改造广西同志会”，韦拔群参加了这个组织。第二年六月，孙中山出兵讨伐陆荣廷，陆兵败逃走。孙

中山委任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八月，韦拔群随马君武到南宁，马君武先后委派他为南丹、东兰县县长。但是，由于当时广西的军政大权实际上是掌握在假拥护真反对孙中山的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手中，韦拔群不愿为军阀服务，不当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坚辞不就。他返回东兰，带领人民群众进行反对军阀、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

第三、发动和组织群众，创建革命团体和革命武装。

韦拔群通过革命实践逐步认识到，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性。因为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革命的任务十分艰巨，革命事业不是一个人或少数人所能完成的。因此，必须把群众发动起来，组织在一个团体之中，共同奋斗。同时，他还认识到，敌人有武装，革命人民要打倒他们，就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所以，1921年9月，他回到东兰后，便联络进步青年陈伯民、黄大权等，组织了以反对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改造东兰的旧政治、经济和文化为宗旨的革命团体——“改造东兰同志会”（1923年6月，改名“公民会”，以便更广泛地吸收群众参加）。1923年5月，他又在东兰县西山建立了第一支农民革命队伍——“国民自卫军”。通过这些组织，带领群众向军阀、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进行斗争。

当时，盘据在百色一带的桂系军阀旧部刘日福，自称为“自治军”司令，派他的部下邓祖貽到东兰滥收苛捐杂税，每户征收五至十二元，俗称为“刘邓捐”。东兰广大农民群众深受其苦。1922年1月，韦拔群在东兰武篆召开了“国民大会”，号召大家团结一致，抵制“刘邓捐”。会后，他偕同陈伯民步行到百色，会见刘日福，陈述东兰农民的痛苦状况，要求停止征收“刘邓捐”。刘日福知道韦拔群与省长马

君武有关系，怕事情闹大，不好收场，被迫同意停止征收这种税捐，并写了停征的布告，交给韦拔群带回东兰张贴。这样，反“刘邓捐”的斗争便取得了胜利。

接着，韦拔群又带领群众进行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头一个目标是武篆区大劣绅杜瑶甫。这个家伙，平时欺压人民，无恶不作。当地群众捐献了八百元兴建校舍的经费，他就贪污了三百多元，群众对他恨之入骨。1922年3月，韦拔群召集群众，对他进行了清算斗争。在无可争辩的人证物证面前，杜瑶甫不得不低头认罪，退回赃款。反土豪劣绅的斗争第一个回合又取得了胜利。

以上两次斗争的胜利，大长了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军阀、土豪劣绅的威风，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了斗争的行列，有的还加入了国民自卫军。于是反对军阀、地主、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群众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

为了打击反动官僚，根据群众要求，从1923年6月下旬至10月下旬，韦拔群先后三次领导和指挥国民自卫军攻打东兰县城。终于在第三次取得了胜利，赶走了反动的县知事蒙元良。

上述情况表明，在1916年——1924年间，韦拔群的革命思想，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发展的，他的革命行动是坚定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但是，必须指出，由于他当时尚未接触马列主义，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的思想认识还有不少缺点。例如，他虽然注意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但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工农大众是历史的主人，是世界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而错误地认为：

“文明世界”是由青年学生“创造出来的”^⑬；他虽然主张“打倒侵略我国的洋鬼子”，但还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

造成中国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根源，而错误地认为：“我国的内乱，都是由军阀争夺地盘，政客互夺饭碗”^④而造成的；他虽然勇敢地为实现农民的要求而斗争，但他还没有认识到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因此，在行动上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

(三)

1925年1—3月，韦拔群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他的革命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阶段，成为一个初步用马列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者。

1924年以前，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运动，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攻占了东兰县城，赶走了反动县知事蒙元良以后，由于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群众的经济要求，农民群众的革命情绪逐渐低落，国民自卫军战士逐渐离队回家。1923年冬，盘据百色的反动军阀刘日福派兵进攻东兰，“公民会”和国民自卫军惨遭失败。

这一挫折，使韦拔群逐步认识到，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有科学的革命理论来指导。为了寻求革命理论，1924年夏，他和战友陈伯民到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当时，广州的革命形势一派大好。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了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成革命统一战线；工农群众广泛地组织起来，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蓬勃地发展。同年七月，广州沙面数千工人举行大罢工，反对英、法帝国主义歧视华人的“新警律”……。这一派大好的革命形势，给韦拔群同志很大的

教育和鼓舞。为了追求革命真理，学习革命理论，1925年元旦，他和战友陈伯民一起，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是该所第三期学员。

韦拔群在学习过程中，善于理论联系实际，“他不但精研书本，还注意实际运用。他常常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自己经历的实际斗争联系起来，总结东兰革命的经验。他常和一起学习的同志讨论革命的各种问题，特别是谈论今后家乡的革命斗争问题。”^⑮这样，他学会了很多基本的革命道理。

“找到了那照耀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前进的光辉道路，找到了组织群众起来斗争的正确方向。”^⑯因而使他的思想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认为只有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韦拔群进入广州农讲所后，一面学习马列主义，一面总结自己的斗争经验教训，“懂得了过去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缺少明确的政治目标和坚强的政治领导。他深深地认识到，能承担中国革命领导的只有中国共产党。”^⑰“认识到只有武装还不行，还要有马列主义的坚强领导。”^⑱因此，“韦拔群在广州农讲所期间，就决心……要‘学习广州’，在右江办起农讲所来”^⑲宣传马列主义，培养农民运动的干部。这些都说明了他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信念。

第二、认识了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死敌，主张打倒帝国主义。

如前所述，过去，韦拔群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他进入广州农讲所后，学习了《帝国主义》等课程，使他逐步认识到，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和发展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采取了各种手段，支持它的代理人，压制中国人民的革

命运动，这是造成中国军阀割据和混战的根源。从此，明确了反帝的任务，认为“农民斗争只有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才有前途。”^{②①}所以，他从广州一回到东兰，就向群众宣传、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号召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他大声疾呼：“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②②}

第三、认识了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主张农民分田分地。

韦拔群在广州农讲所，由于学习了《农民运动》等课程，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济落后，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广大农民群众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因而具有强烈的革命性，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非发动农民起来不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给农民以土地，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内容。1925年以前，东兰县农民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没有进行土地革命，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而不能把农民革命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持久地坚持下去。因此，他下定决心，今后一定“要解决土地问题”^{②③}。他回到东兰后，立即宣传群众说：“田地也是我们农民的，我们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工农民主政府，就分田地。”^{②④}

第四、认为在发展农民运动中，组织农会和建立革命政权十分重要。在建立革命政权的条件尚未具备前，则应该“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

韦拔群在农讲所期间，学习了《农民运动》、《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自学了《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著作，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②⑤}，体会到在农

民运动中，“要把农民大众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②⑤}，斗争才能取得胜利。过去，东兰的农民运动，由于没有一个坚强的组织，没有建立革命政权，结果，农民运动象一阵风地吹过去，胜利果实不能巩固下来。因此，必须吸取教训，一定要象广东、湖南等省那样，把农民发动起来，组织农会，逐步创造条件，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在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条件尚未具备时，在农村，农会可以暂时行使政权的权力，这是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所以，1925年3月，韦拔群从广州带回了党中央制定的《告农民书》、《农会组织法》等农运材料，回到东兰后，立即到各区进行宣传，筹组农民协会，号召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农会，组织起来力量大，才能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②⑥}在农会初步建立起来以后，他又提出了“一切权力归农民协会”的口号^{②⑦}。在他的号召和组织之下，“到八、九月间，东兰县便成立了七十多个农民协会，拥有会员两万余人。”^{②⑧}

（四）

1929年12月，韦拔群参加了百色起义，建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后来，又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和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在革命斗争中，他逐步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和共产主义世界观，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了革命乐观主义，随时准备为革命而牺牲。

韦拔群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在阶级社会里，他们却处在受剥削被奴役的地位，应该用革命的办法把他们

解放出来。他说：“快乐事业，莫如革命。”^{②⑨}意思是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是人生最有意义和最愉快的事。

干革命是免不了要付出代价的，有时甚至要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韦拔群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1930年4月，东兰县赤卫军总指挥牙苏民同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韦拔群痛失战友，悲痛异常，挥笔写了挽联一副：“在红军，任赤军，都是为救人民而革命；你先死，我后死，大家为革命而牺牲。”^{③⑩}这表明，韦拔群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了共产主义事业，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韦拔群不怕牺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他的行动中也经常表现出来。例如，1928年11月，他和警卫员罗万运外出工作，在路上被敌人围困了五天。在这五天当中，两个人分吃七个象拇指大的红薯和草根度日，生活异常艰苦。但拔群同志毫不在意，还有趣地吟诗：“半截红薯夹草根，一点一滴甜进心。”^{③⑪}1931年，桂系军阀趁着红七军主力已经北上，右江根据地革命力量薄弱之机，派廖磊率领一个军的兵力向革命根据地打来，实行烧光、杀光、抢光、铲光的政策，妄图消灭革命力量。这时，韦拔群同志指挥部分红军，以东兰西山为中心，坚持游击战，抗击敌人。他们住山沟，睡丛林，穿山洞，守险伏击，顽强地战斗，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廖磊毫无办法，只好到处张贴布告，说谁能割下韦拔群的头，奖给光洋五千元。韦拔群听到这个消息哈哈大笑地说：“我的头太值钱了，能值五千块光洋。……我也可以出布告：谁能砍下廖磊的脑袋，特奖花红五个小铜板。”^{③⑫}后来，他将计就计，叫战士把他绑在担架上，涂上一些鸡血，装扮成被打伤的样子，然后叫敌人派人挑银子来换他去。愚蠢的敌人中了计，花红钱被红军接收了，又挨了伏